



王佑夫 著

民族出版社

中国古代民族

詩學

初探

3311

中国古代民族

语言学

初探

王佑夫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民族诗学初探/王佑夫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1

ISBN 7-105-04871-9

I. 中... II. 王... III. 少数民族文学-诗歌-文学理论-研究-中国-古代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 第 002087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民族出版社微机照排 艺辉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125 字数:180 千字

印数:0001-1500 册 定价:14.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64212794;发行部电话:64211734)



王佑夫，四川巴中人，曾就读于三汇小学、渔溪小学、恩阳中学、巴中中学、西北大学中文系。现任新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指导硕士研究生，并与苏州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先后被评为国家特殊津贴专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全国优秀教师。曾宪梓教育基金会二等奖获得者。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教学与少数民族古代诗学研究，出版有关著作多部，发表论文数十篇。

序 言

刘魁立

民族文学研究是一个建立未久的新学科。在近二十年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用“辉煌”两字来形容它的成就当不为过。一大批新人的成长使从事这一事业的队伍渐具规模；这一个学科的框架建构也日趋合理；许多优秀成果让人感到欣慰；提出的诸多理论问题，也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得到更为完满的阐发。这番辛苦的耕耘，以及它必然产生的可喜收获，为将来的学科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任何学科在它建立的初期，总不免要经历一段在朦胧中逐渐“寻找自己”、“明确自己”的过程。由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是一个新的学科，所以，我们首先接触的是许多繁细而具体的问题。一个时期，我们的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作家专论和作品专论上，集中在文学现象的描述和评释上。这是历史的必由之路。大约就在这同时，或许是稍晚一些的时候，一批以王佑夫等同志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把自己的目光投向少数民族的历代文论。这项

事业与研究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历史当中的诸多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文学运动、文学发展规律等问题，是同样重要的课题。应该说“文学批评”和文学的发生、发展是完全同步的，仅仅有是否形诸文字，从而流传下来，或者没有流传下来；是否深刻、是否形成体系，从而被社会、被历史所接纳和承认或者淡忘的区别而已。文学发展到一定时期，积累的经验总会有人出来总结，为了进一步的繁荣，总要呼唤对它进行学理性的提升。于是，许多理论著作应运而生。中国的、印度的、希腊罗马的诗学著作的诞生，都是最好的实例。

1989年1月我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编辑出版说明》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中国文学，是包括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国所有民族的文学的总汇。

每一个民族的文学，都以其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形式以及深厚的文化蕴涵，显示出它独有的优长和特色。

每一个民族的文学，都有自己发生、发展的历史。所有民族的文学以各自特有的进程，共同汇成了中国文学的丰沛的历史长河。

各民族的文学在长期的共同发展过程中，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借鉴、互相推动。各民族文学异彩交辉、相融共进，使得中国文学具有了历史悠远的、多元化的民族蕴涵和极为深厚的民族特色。

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学实践，给它们的文艺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土壤、阳光和灵感。

说到文艺理论，我们往往会有一种错觉，仿佛它全然是一种超民族、超国界，甚至是超时代的理论建构。世界各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是极其复杂和多样的。每一个民族文学的具有鲜明特色的传统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不断演进。各个民族文学的绚

丽的特色，使世界文学的百花园具有了极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这种丰富性和多样性也决定了各民族文艺理论的多样性和独特性。那些放在一个平面上看去或许是规模不一、分量有别的著作，对于各自的民族、各自的民族文学来说，却都有着深刻的意义和不可小觑的作用。那么，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把它们放在一个平面上看呢？任何一种民族文学对于该民族来说，作为一种价值而言，都是同样重要的，从这个角度说来，各个民族的文学，是处于平等地位的，而它们的文学理论，对于它们的文学发展，也同样提供了其他民族的文论难以替代的推动前进的助力。

有的时候，我们的文论研究，仿佛是在一个自足的体系里运作。尽管谈的是文学，也援引无数的文学实例来说明作者的理论原则，但这种运作总给人一种与此前此后的文学发展的历史“不搭界”的印象，这种运作总仿佛是在自说自话。读王佑夫先生的这部著作，就没有这种感觉。他把文学理论同各相关民族的文学实践结合得那样紧密，那样水乳交融，使人透过这些理论文字的三棱镜，看到了各民族文学的令人炫目的绚烂彩虹。

廿年辛苦不寻常，王佑夫先生别具慧眼，把自己的才智奉献给了少数民族的文论研究，开拓了这一片新的天地。他由编纂《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文论选》作为起点，继之，对这些文论进行了学理性的分析和研究。每有所得，形诸文字，发表于相关刊物，总会在有关学界产生一定的反响。由于工作的原因，我也多有先读之快。这次王佑夫先生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我再读之后，暗自觉得这些发表于不同刊物、不同年份的论文，原是分别定位在他经过仔细推敲的一个体系之中的。他探讨中国古代民族诗学的精义，也是深刻的和有见地的。民族文论与民族文学的发展并驾齐驱，历史悠久、博大精深，阐发其精微、穷极其义理，决非能毕其功于一役，而且是要有一批像王佑夫先生这样甘于寂寞、甘于奉献的研究家共同努力才能做到。

·中国古代民族诗学初探·

序曲已经奏响，威武雄壮的乐章不是就会紧随其后吗？欣喜地读过这部《初探》之后，我热切期望王佑夫先生的是，他能有更为体大思精的中国古代民族诗学通论贡献于世。谨为序。

2001. 6. 12

目 录

序言	刘魁立(1)
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1)
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学科的形成与发展	(10)
民汉比较诗学的总体思考	(31)
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多样化存在形态	(42)
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发展简述	(54)
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价值与地位	(63)
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研究对象与方法	(79)
中国古代文论的瑰宝	
——彝族古代文论试探	(85)
鲜卑匈奴后裔对唐代汉语诗学的贡献	(99)
它并非一片荒漠	
——维吾尔族诗学简论	(112)
清代满族诗学发展概观	
——清代满族诗学纵横探之一	(126)

·目录·

清代满族诗学的基本特征	
——清代满族诗学纵横探之二·····	(141)
清代满族诗学的主要贡献	
——清代满族诗学纵横探之三·····	(157)
附录	
少数民族美学研究断想·····	(172)
马祖常及其诗歌创作·····	(181)
歌唱生命	
——《江格尔》门外谈·····	(201)
后记	
冷落一隅话甘辛·····	(210)

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的 回顾与前瞻

多民族的国家构成，决定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多元性。然而，由于众多的原因，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研究者的视野只局限于作为主干的汉民族文论领域，而异彩纷呈的少数民族文论却成了研究的盲区。进入新时期以后，在改革大潮的冲击下，人们的思维，由封闭走向开放，眼界由狭隘变得开阔。终于有一批探索者迈进了少数民族古代文论那片宽广的天地。少数民族文论研究尽管筚路蓝缕，困难重重，但还是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并展示了无比迷人的前景。

八十年代伊始，作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奠基人的郭绍虞先生就意识到时代赐予中国古文论研究的新机遇，因而及时地向研究界发出呼吁：“应该扩大我们的研究领域”，改变长期以来“较少注意兄弟民族的理论”的状况，并欣悦宣告：“兄弟民族的文艺理论也有所发现”^①。为了彻底改观少数民族文论研究的落后局面，一个首当其冲的任务摆在了研究者面前：基础工程的建

^① 《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载于《人民日报》1980年11月5日。

设，即原始资料的搜集、挖掘、翻译和整理，这是展开大规模、高层次研究的必要前提。一些研究者为此项繁琐、平淡、艰巨而又意义重大的工作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并很快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收获。1981年，云南的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率先推出了岩温扁搜集翻译的《论傣族诗歌》，这“是对我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①。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为研究者们打开了傣族文论的大门，而且在于，它预示了将有更多的大门被打开，它使人们对少数民族文论宝库开掘前景的乐观猜想得到了初步证实，对有志于少数民族文论的研究者们，是一个有力的激励和鼓舞，还是一种启发和召唤。继之而来的一个重大收获，是1987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文论选》（买买提·祖农、王弋丁等主编）。这是第一本综合性的少数民族文论选，尽管由于其草创性质，不可避免地存有选文不够全面精粹、注释与说明偶嫌粗疏等缺憾，但它的价值和贡献却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体现出一种崭新的开放性眼界；其次，它填补了我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空白，使人们对中国少数民族文论有了一个初步的、概貌的了解；第三，它为今后这类工作的深入展开，为更加完善的选本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因而该书问世后，受到海内外的关注。次年（即1988年），康健、王子尧、王冶新及何积全等同志翻译整理的《彝族诗文论》面世；接着，他们又推出了《论彝族诗歌》和《论彝诗体例》。这三部著作，引起学界震动。它们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彝族文论的实貌和储量，在各少数民族文论资料的搜集整理方面，无疑处于领先地位。

伴随着资料的发掘和整理，人们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研究工作也同步展开。在最初阶段，这种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

^① 王松：《一个重要的新发现》，见岩温扁整理翻译《论傣族诗歌》，云南，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1。

面：一是对原文的注释和说明。几乎每一本文论选，都有比较详尽的注释，有的每篇原文之后还附有简短的说明。这其中就凝结着编选者的认识、体会和评价；一是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概观性、扫描性的评述。在这方面最值得重视的是一些著名专家学者的见解。

贾芝先生在《序彝族诗文论》一文中，首先谈到民间文论存在的必然性。由于“诗歌起源于民间”，在各族人民群众中间，“不乏荷马式的人物”，“他们是民族史诗的传播者和创作者。他们也该是最懂诗学的”。因而在民间必然存在着丰富的诗论遗产。在谈到举奢哲的《彝族诗文论》和阿买妮的《彝语诗律论》时，认为他们关于诗歌创作的方法和要求有六个要点：一是诗要有“主旨”；二是“必须有诗骨”；三是诗歌既要富于文采，又要“诗意深”；四是知识乃诗歌之源泉；五是诗歌既要反映现实生活，又要寓褒贬于其中；六是诗歌要讲求韵律。贾芝先生进而评价道：“他们全面地论述了彝族的诗学。他们的这些论诗的创作方法和一些严格的要求，说明彝族的诗论、诗律论构成了它自己的诗歌理论体系”。可以说，这篇序文提炼出了彝族诗文论的理论精髓，正确评估了它的理论价值，为进一步的研究指示了方向。

人们大都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汉民族文论是中国文论的主体，少数民族文论是中国文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从中国文论整体结构的视角，审视汉族文论与少数民族文论的双边关系，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课题。张文勋先生在《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文论选·序言》里，着重就这个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认识。他认为：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一些文艺观和美学理论，“都是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和不断交融的产物”，这是就各民族文论的共性的一面而言；同时他又指出：“就各个民族而言，他们的民族文化、民族性格、审美观念，又各自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有些直接产生于本民

族文艺土壤中的文艺理论，非常鲜明地反映出该民族所特有的审美观念”，这就是说，各民族文论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形成个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张文勋先生特别强调了宗教的影响与形成各民族文论不同特色的关系。张文勋先生的序言，实际上提出了少数民族文论研究必须遵循的两条原则：一是不能简单地把少数民族文论看作汉民族文论的特殊表现形态或附属物，在看到彼此共性一面的同时，更要重视少数民族文论的特异性；二是不能割断彼此的联系，孤立地研究少数民族文论。

同汉族文论一样，各少数民族文论也都有着漫长的发展过程，因而探寻其各自的演进轨迹，当是少数民族文论研究课题中的重要内容。这正是刘魁立先生在《论彝族诗歌·序》一文中强调的问题。他指出：“自魏晋以来，关于彝族诗歌的理论观照，论者代有才人，著作连绵不断，涉及全面，体大思精，不仅具备了泱泱堂堂的宏大规模，而且已经形成为传统，其发展之轨迹，历历可寻，这不仅是诗歌发展的理论总结，而且也是理论思维自身的演进和深化”。他认为：漏侯布哲、实乍苦木等人的诗论在继承举奢哲、阿买妮等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使得某些理论更系统、全面，更发人深思。刘先生这些见解都是十分精当的。

几乎无人怀疑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从少数民族中得到了不可缺少的推力；但其推动力的强弱大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有所区别的。周来祥先生在他为《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文论选》续编《少数民族古代文论选释》（王弋丁、王佑夫、过伟主编）写的《序言》中认为：少数民族文论对中华民族文论的独特贡献，在两个时期表现得格外鲜明：“一是远古时期，他们的神话、传说、诗歌中，有对文艺和审美起源的美丽想象，可以启发我们的灵智与思考，进一步去探索艺术起源的奥秘。二是由古代向近代的转折、嬗变时期，在这一时期有不少重大理论问题，是由少数

民族出身的理论家提出的”。周先生的这一观点，对我们衡量少数民族文论在中华民族文论史上的地位和贡献，是一个宝贵的提示。

上文所举专家学者的文章，都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论文，其所论大抵都是感想式和印象式的评述，但他们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却都是重大的课题，对于研究的深入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另外，在《民族文学研究》所开辟的“古文论研究”专栏里发表的文章，也是近年来少数民族古文论研究实绩的一部分，对于它们的价值和贡献，这里恕不一一评说。

回顾近十年来的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应当承认，成绩是显著的。但从发展的观点看，以汉民族古代文论研究的水平来衡量，近十年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所取得的进展还仅仅是个开端，在研究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待于大力深化和拓展。当然，不管怎么说，我们毕竟已经拥有了一个可喜的较为扎实的基础。立足于这一基础，展望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前景，我们猜想，重要的进展和突破也许将在下面几个方向上出现。

首先，资料的发掘、整理和出版，在今后仍将是重点工程之一。作为基础建设，这方面还有大量艰巨的工作要做。我国拥有五十多个民族，到目前为止，仅有十几个民族有文论资料出版，这意味着大多数民族的文论遗产，至今还处于沉睡状态，有待人们去发现、挖掘和整理；另一方面，即使那些已经出版的文论，也只是它们所属的民族文论中的沧海一粟，经过进一步的搜寻和钩沉，或许会有理论价值更高的资料被发现。

由资料工作的重要性所决定，考据和注释也仍将是今后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不仅新发现的资料需要辨析和诠释，而且那些已有的论注，也还有个再认识，再推敲，使之由粗疏走向精确的问题。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在整个研究格局中，它虽然并不总是处于重心位置，但作为研究基础，资料建设将永远制约着

整个研究水平的提高。顺便一提，受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的启发，现当代少数民族文论研究，已引起部分研究者重视，可望不久的将来，在资料的编选、出版方面有填补空白意义的成果问世。

不过，随着资料的日趋完善和丰富，真正的突破，毫无疑问将表现在研究的深度和高度上，这里可能有两个走向：

其一，由一种说明性、描述性、概括性、印象性的介绍和评述，走向深层次的理论探讨。一个民族的文学理论，不仅受着该民族文学活动和文学传统的制约，而且受着该民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历史沿革、风俗习惯、生存环境等众多非文学因素的影响；反过来说，这一切又必然孕育出打上该民族印记的、特殊形态的文学理论，并物化为一些特殊的理论概念和范畴。比如彝族文论，对此开展翻译与研究的康健、王子尧、王治新、何积全等同志在《论彝诗体例》一书《后记》中深有感触地写道：“彝族诗论和彝语诗律是自成体系的一种民族文艺理论，它有一整套的专用术语，例如：诗律方面的声、韵、押、扣、连、对、阶、偶、字、句等等，诗论方面的主、体、题、骨、肉、风、采、神、色、景、立、惊等等，翻译整理时是最费力费时的了。这一类的术语，一个字从初步译出到基本写定，往往要经过几个人长时间无数次的反复推敲，后来虽然勉强敲定，有的仍然未能惬意：或者在此文章上说得通，到了彼处却产生了矛盾；或者即使并不矛盾，却总觉得不甚贴切。”这段话，不仅使我们看到翻译整理者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而且也使我们认识到，彝族文论由于其特异的理论形态，为人们研究和探讨，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坦率地说：康健诸同志对彝族文论概念范畴的解释，尽管是颇见功力的，但绝不是惟一的和结论式的。

其二，由对局部的微观审视，走向对全局的宏观把握。所谓

的微观审视，主要是指对民族文论中单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所谓的宏观把握，是指对民族文论的综合性和整体性的研究。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因为只有在对民族文论的所有概念范畴获得充分认识以后，人们对它的全貌才有可能得到完整透彻的把握；而后者则是对前者的超越，它是站在思维的制高点上，对民族文论的理论结构进行综合性、整体性的考察。需要说明的是：微观和宏观是相对的，这里有两种意义上的微观和宏观。就某一个民族而言，对其文论的整体研究是一种宏观把握，但是相对于整个少数民族文论而言，它又是一种微观研究。这种意义上的微观研究，是为了把握各民族文论的个性；而全局观照则是为了把握整个少数民族文论的共性和统一性。无论哪种意义的宏观研究，都有许多很有价值的课题等待人们去探索。例如，少数民族文论的理论表现形态问题，就是一个价值很高的命题。从体制方面看，少数民族文论以散篇为主，亦有专著。这些散篇又分为各种文体，如序、跋、注、疏、评点等，它们往往以吉光片羽似的妙语精言表现少数民族人民的审美直感。它们虽然是零散的，但集合起来，是否就构成了某种系统性呢？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少数民族文化宝库中，有一种多学科知识融合交叉的著作（如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它是一种混合型思维的产物；这种混合型思维，对少数民族文论有些什么影响呢？就语言载体而论，则包括汉语型和民语型两类。我国绝大部分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其中约二十个民族有自己的文字，个别民族的文字还几经变更。语言是理论思维的物质材料。各民族语言的差异与文论的差异之间有什么内在的联系？某些民族的文论是否随着文字的变更而变化？各种文字载体的文论之间有无继承性？其延续性是怎样维持的？从流布方式来看，既有被文字凝固的静态的书面文论，也有在人民口头传播的处于动态中的口头文论；这两种文论之间有什么联系性和差异性？处于动态中的口头文论又是怎样演变的呢？上述